

# 新媒体话语赋权下的边缘抗争

## ——基于一个艾滋病论坛的话语分析

胡雨濛

**摘要：**新媒体改变了话语控制的图景，赋予边缘群体和弱势者言说自我的权利。通过对一个艾滋病论坛帖子的话语分析，研究身负艾滋污名的个体如何策略性地进行话语抗争。研究发现，边缘群体并没有对主流话语所加诸的污名逆来顺受，但他们也很少进行旗帜鲜明的维权抗争；相反，他们通过微小的、甚至诗意的话语抗争来试图消解污名。关于艾滋病的在线话语抗争至少包含四种策略：用“慢性病”替代“瘟疫”或“传染病”的命名，试图建构不带道德色彩的艾滋病知识体系；将患病编织于命定逻辑中，弱化自己的行为责任，回避可能蒙受的道德指责；强调“性乱”的亚文化特征，认为性自由是人性自由的一种形式；为“同性恋”正名，以“爱”为线索，以“宽容”为口号，建构符合同性恋群体利益的感染叙事。

**关键词：**污名；话语；艾滋病；命定；同性恋

**作者简介：**胡雨濛，女，讲师，博士。（浙江理工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6) 06-0049-07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及艾滋病时，往往跳出医学框架，而在一个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生活世界中。艾滋病被赋予了很多带价值判断的意涵，其相关群体也常常被诸种话语所污名。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受损的身份”体验：使人感到羞辱的特征或属性，如身体上的缺陷、品质的污点，或者是不受欢迎群体的成员资格。<sup>[1]</sup>就健康领域而言，污名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疾病都要负载不同程度的污名。医学不断发展，并没有消除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从鬼祟附体、神灵惩罚到道德败坏，人们变换着对麻风病、精神疾病、性病等疾病的表述与阐释。

经验地看，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污名，但艾滋病被污名的情况尤甚。以下四个条件被认为是导致疾病高污名的原因：疾病的产生被认为是患者的责任、疾病难以治愈甚至致死、疾病具有可传染性、疾病的症状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这四个条件仿佛就是为艾滋病专门设置一样，无怪乎它在出现之初就与污名和歧视息息相关，从未消减。

HIV 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行为传播的，包括无安全措施的性行为、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无卫生保障的卖血和输血、HIV 阳性妇女的生产和哺乳中的垂直传播等。由此，艾滋病这一讯息的符号意义是和性关系错乱、同性恋以及吸毒这些“不道德行为”密不可分的。追根究底，对艾滋病道德指责的意义在于否认与艾滋病相关的生活方式；性乱、同性恋等价值取向，是难以为传统文化所包容和认可的。因此社会中还有不少人将艾滋病当作一种天谴、瘟疫，视为肮脏和羞耻的象征。

那么，感染者对这种污名的情况是逆来顺受的吗？他们有权利进行“去污名”的抗争吗？在传统的语境下，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感染者在现实生活中会隐藏自己的病情，我们的社会很少赋予他们“自我表述”的渠道，他们的声音为诸种话语所遮蔽；他们的故事为国家防控体系下的疫情报告所替代，他们的抗争诉求为道德审判所抹杀。即使在主流媒体中出现了“说话”的感染者，他们往往也是

扮演感激涕零或现身说法的角色,其话语依然是被主流框架筛选,被意识形态规训的。

直到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话语控制的图景,感染者得到了自我表述的赋权。“知艾家园”(http://www.120x.net/)是一个关于艾滋病交流的论坛,诸多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在其中既倾诉极为私人的患病故事,又将艾滋病作为一项公共社会议题进行讨论。德塞图试图用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来“阐述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sup>[2]</sup>。他相信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言谈的力量,并将之作为一种足以改变日常生活本身的微政治。人们在规训网络之中并非毫无抵抗能力:文化霸权者用“战略”宰制意识形态,“一般人”则用“战术”——如言说、阅读、行走、购物、烹饪等——伺机而动,在强者掌管的空间中迂回地渗入权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语言和文化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sup>[3]</sup>,生活世界是一种由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德塞图认为叙事是一种“说的艺术”,“当普通人变成叙述者的时候,当他确定了话语的场所以及话语展开的空间的时候,文化的临近便开始了。”<sup>[4]</sup>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知艾家园”这样一个网络论坛的民族志研究,包括对论坛帖子的文本和话语分析,探讨这些身负污名的个体如何策略性地进行话语抗争,努力逃离道德漩涡。

## 一、慢性病命名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开端。将一种疾病命名,表明了社会对其的基本认知和分类。艾滋病在发现之初曾被美国CDC命名为GIDS(Gay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大概因为起先的几例艾滋病都发生在男同性恋的身上,在统计学上男同性恋与罹患此病呈现高度的相关性。随着异性恋者病例的出现及共用注射器、输血、母婴传播途径的发现,这一疾病的名称才被修正为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确切地说,将AIDS译为“艾滋病”——尤其是早年间译作“爱滋病”——本身就附加了一些社会寓意:这是一种因“爱”滋生的病,性行为是其罪魁祸首。

早些年,包括媒体在内的主流话语常用“瘟疫”来指称艾滋病,这一命名时至今日仍然甚嚣尘上。瘟疫,既包含了大范围传播并致死的趋势,又象征了道德的毁灭和毒害——在“工具”和“符号”双重意义上将一种疾病妖魔化与污名化。艾滋病曾被认为是“同性恋瘟疫”,但是自从人们认识到所谓的“同性恋瘟疫”并非只侵袭同性恋者时,瘟疫之名更是愈演愈烈,对疾病的恐慌盘桓在全社会的上空。人们立刻联想到过去那些令人胆颤和厌恶的流行病:霍乱、麻风、黑死病等。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艾滋病并不会像瘟疫那样威力十足,至少,它是可防可控的。但不可否认,它是一种“传染病”,其传染性足以让人人自危。人们谈艾色变,惧艾如虎,“工具污名”仍然不可消减。不管是“瘟疫”之名还是“传染病”之名,艾滋病感染者都发现主流社会加诸其上的疾病命名不利于自己带病生存并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所以他们试图重新命名和界定“艾滋病”,改变旧话语,创造新话语,从而争夺话语边界。例如,有一位感染者G\* \*6在论坛中反思和表达了“艾滋”这一疾病命名所附带的负面寓意:

“艾滋病”一向带着对患者的贬低和歧视。“艾滋”两字令患者强烈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贬义和歧视,羞辱感和自卑感一直困扰着众多病人和感染者。几年前,就已经有专家呼吁对诸如“红斑狼疮”、“脑梗死”、“老年痴呆症”等难听的疾病改名。如何给棘手的疾病改名?不但需要有科学的智慧,更需要有一颗对患者的爱心。(G\* \*6)

文本是经过修辞组织而成的,而且可以提供关于世界的竞争性观点。语言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只在于它具备用新的方式言说旧言语的能力。在“知艾家园”中,很多感染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艾滋病定性为“慢性病”,努力言说艾滋病的慢性病特征,弱化其他特性,以形成新的、利于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体系。

我并不恐怖艾滋病,它只是一种慢性病,隐藏在我的体内罢了。我正常地过着我的日子

子，上班、生活、恋爱、交友、走亲戚、逛街、追求时尚。我就是这样继续活着，跟以前不同的是，我每天早上9点和晚上9点各吃一组药丸，仅此而已！（s\* \*n）

艾滋病就是个慢性病，只要坚持治疗，按时服药，是能活很久的，像那些乙肝、糖尿病什么的，也是治不好的慢性病，也要终生服药。（陕\* \*子）

现在这病已经和糖尿病一样了。多休息，提高免疫力，注意cd4，到了吃药的阶段一定要吃药，只要保持cd4在300以上，就永远和健康人没区别的。（彩\* \*组）

“慢性病”话语的命名和言说，刻意忽略的是其传染性和与越轨行为的相关性。借此，感染者希望将其建构成为一种类似于糖尿病的疾病：没有道德污名，没有传染风险，只要注意日常生活保养并遵医嘱就无异于健康群体。

事实上，艾滋病的确并不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大范围蔓延，HIV感染者也并未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死亡。一方面，HIV的传播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临床上已经有了一些控制病毒的方法。这为慢性病的命名提供了相当大的说服力。

以慢性病来命名艾滋病：对感染者而言需要确立“带病生存”的乐观信念；对非感染者而言需要适应与感染者长期相处的模式；社会则须为对付这种疾病制定长期的策略，包括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保健和社会支持。

当艾滋病的解释框架从“瘟疫”转变为“传染病”再渐渐发展为“慢性病”时，其所承载的符号污名和工具污名逐渐消减。在慢性病的框架中，重点考虑的是包含而不是消除。一旦这种命名的言说成功地占据上风，感染者的生活境遇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 二、命定叙事

叙事是一个解构以及归因疾病的强大工具。在“知艾家园”中，感染者常常将患病编织于一个命定的逻辑中，用“天注定”来解释自己感染的结果，以此弱化自己的行为责任，回避可能蒙受的道德指责。

头几天才去了几个朋友。一个是去灾区被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了；还有一个战友过年因为喝酒离开了我们。生命充满了偶然。我不怪任何人，我的命运安排我会感染艾滋，我认了。这就是命运，天注定的。（w\* \*3）

这条帖子叙述了几位朋友的意外去世，由此将感染HIV类比为生命中的偶然，仿佛一切只能归咎于命运，个人在其中完全无能为力，也没有过错。既然命运都是天命决定的，那么生命中的荣辱、福祸都是不可抗拒的，感染HIV也是一件早已由上天安排和注定好的事情。

研究表明，对于命运的观念受到文化的显著影响，在西方崇尚个人奋斗的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个人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战胜命运；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体更倾向于相信命运对人生的掌控力。<sup>[5]</sup> Zhang和Ding通过对一个美国艾滋病论坛和一个中国艾滋病论坛中帖子的叙事研究发现，美国论坛的帖子更多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中国论坛的帖子则往往以天命来解释感染。<sup>[6]</sup>

中国古代哲学把天当作神，天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天命最初的意思是天子承袭上天之命。在中国历史上，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的过渡常常被用“天命”这样的修辞使之合法化。

天命是一种人们解释并使生活中的改变合理化的终极借口。遇到天灾人祸时，人们往往说：这就是“命”。人们试图将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归结为是命运的安排。因此，当感染者用命定叙事时，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无法控制也无须负责。

《论语·颜渊》中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也常与遗憾一起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运用最广的自我安慰和平复情绪的工具。当感染者告诉自己或劝慰其他的病友“这都是命运的安排”的时候，他们便不再对“为什么是我”耿耿于怀，也能对“自作孽”的悔恨多一些释怀。

在这个主题下，人们常常使用这样一个词语：“鬼使神差”，指的是在邪恶的力量的驱使下，无意

中犯了“错误”。

我喝多了，想到了与我分手的女友，心里很懊恼，然后我鬼使神差地出去找小姐。做完后她跟我说，她有艾滋病，她已经是废人了。我酒醒了好后悔，这就是命吧。真的是鬼使神差，完全不受控制地去了那种地方。（后\* \*3）

这条帖子反复强调了“鬼使神差”和“不受控制”。因为犯错是受鬼神引诱，因此是值得原谅的，无可厚非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主题不论从个人还是社会层面而言都离开了道德的考虑。

### 三、性乱何错？

“性”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所谓“万恶淫为首”，在中国性乱被一度视为对传统道德文明最恶劣的背离。桑塔格说过：“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sup>[7]</sup>HIV的性传播渠道，使感染者和相关人群蒙受百般羞耻。同为疾病，凡经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传播的疾病总显得比经过性渠道传播的“下半身疾病”光彩得多，病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健康人寻求同情和慰问。

现代社会，国人似乎已经可以正常地看待和谈论“性”，那么在世俗的眼光中，性乱之错在于“乱”。“乱”意味着性关系已经形成一种链条，不仅联结着现时交媾的双方，还与双方过去的和将来的性伙伴都联结在性网络中。Laumann等人提出“性的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们，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为给网络化地组织起来了。而有一些“桥梁人群”，正是连接了几个“性的网状实体”，使网络系统更为庞大，也更加危险。<sup>[8]</sup>通俗地说，一旦做爱，且只要有一方曾经有其他性伴，个体就已经“上网”了。

在性乱实践中，卖淫与嫖娼蒙受了最大的舆论攻击和道德蔑视。传统的性行为评价体系认为，受祝福的性行为应该是婚内的、一夫一妻的、生殖性的、非商业性的。显然卖淫与嫖娼绝非传统意义所认定的美好的性，受此波及，即使是不带金钱交易的性乱也逃不开舆论的漩涡。而对于性工作者而言，当“艾滋病高危人群”这样一个身份加诸其上时，意味着他们一旦感染，属于咎由自取。性工作者把自己置身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之中，他们的行为不仅不健康，还是“放纵”，甚至是“犯罪”。

自从艾滋病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之后，艾滋病就和性道德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报纸常将之作为嘲讽西方社会的性解放的证据。《人民日报》1988年9月19日的《艾滋病，由爱滋生吗》一文说：如果说艾滋病确是一种文化，毋宁说得确切些，是病态的文化和文化的癌症。它是与西方后工业社会同步到来的性病，是一朵爱情贬值的恶之花。艾滋病以一种红牌警告的方式告诫说：“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

面对性道德的指责，有的感染者悔罪自新，有的论坛成员却试图通过话语叙述证明性乱无错，至少可以被原谅。与主流文化相比，性乱应该算一种亚文化，它背离了正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纵容性自由与本能，反对性压抑。

在一些论坛成员看来，性乱没有违背道德本身，因为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对别人未造成伤害，也是正常欲望的发泄。

肯定有人想说我是活该，可是我真的有错吗？我没害过一个人，没用下流手段骗女人上床，没去碰那些单纯的女孩。（3\* \*1）

难道说，一次去找小姐得了大病我就不是人了吗？谁错了都有一定原因，起码他符合了一个人该有的欲望，是他忽略了安全。（w\* \*3）

性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存在方式。性的观念和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从服务于生育到稳定家庭关系，再到满足个体需求，性观念呈现出逐渐开放和日益多元化的倾向。性观念的变化引发了性行为的改变，随之导致性关系的复杂化。论坛成员认为自己因为性传播途径而感染艾滋病没有



道义上的缺陷，在他们看来商业性行为——通俗地讲就是“找小姐”——只是一种性器官的商品化交易，一方付出金钱得到性满足，另一方付出肉体获得金钱，无关情感与人伦。

其他一些论坛成员认为性乱是对当前个人处境和社会环境的一种调节与适应。

我是个刚毕业踏上社会不足一年的学生。由于摆脱了家里的束缚，在单位的宿舍里生活，又没有女朋友，多少想出去找点乐子，本来无可厚非。你看看中国的农民工有1-2亿，他们在外打工缺乏必要的性发泄途径。所以找小姐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其实找小姐本身没错，食色性也嘛。(b \* \* n)

不管是学生也好农民工也罢，因为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又因为身边没有固定的性伴侣，缺乏必要的性发泄途径，所以在一些论坛成员看来，嫖娼“无可厚非”、“本身没有错”，毕竟“食色性也”。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下，性乱显得合德、合理甚至合法了。

人本主义理论把性自由视为人性自由的一种形式。所以部分论坛成员不仅不以性乱为错，反而将其宣扬为一种潇洒肆意的生活态度。

我是一个贪玩的人，活的时间长短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活得精彩灿烂才是我的目的。我宁愿用老去的二十年时光来换年轻时一年时光，因为年轻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玩自己想玩的东西，随心所欲，精彩飞扬！(担 \* \* 死)

在这条帖子的话语建构中，性乱成为了活得精彩灿烂、随心所欲的一种渠道，成为年轻的象征。所以，发帖人认为因性乱而感染 HIV 是自己对人生方式的选择——“用老去的二十年时光来换年轻时一年时光”，无关道德，也毋需悔恨。

还有一些人本着“法不责众”的观念，试图以统计意义上的“性乱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来洗清性行为感染的污名。

优秀的男人嫖娼，女性朋友们，你们想得通吗？不管你们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上到达官显贵，下到黎民百姓，从官员、厂长、经理，到货车驾驶员、修单车的、打工仔，甚至拾破烂的，各有各的层次，各有各的玩法。(大 \* \* 哥)

我听防疫站的科长说现在得这种病的人真的很多，有很有钱的老板，有干部、老师、学生、小孩子，什么样的人都有。不一定说得了这种病的人一定就是坏人。(爱 \* \* 妃)

在这些表述中，嫖娼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涉足性乱亚文化圈的已不纯粹是传统观念中堕落的社会渣滓，还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某些人。他们列举了一系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和风骨之辈，如官员、经理、老师之流，以证明“得这种病不一定就是坏人”。

## 四、同性恋何辜？

“如果 Dugas 不是同性恋者，也许艾滋病疫情最初就不会在同性恋人群中爆发了。”几十年过去了，研究艾滋病的医学专家还在念叨。他们念念不忘的 Dugas，有全世界“001 号艾滋病患者”之称。由于报告的病例最初大多集中在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一度被描述为“同性恋瘟疫”。统计学上的高度相关性导致了 GIDS（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病）这一名称，由此把此疾病与同性恋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即便如今，男同性恋依旧无法摆脱艾滋病的“源头人群”和“高危人群”的标签。一方面，同性恋群体由于缺乏社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障，往往比异性恋人群更容易拥有多个性伴侣，增加了感染机会；另一方面，不安全的性交方式也是造成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因子，男同性恋者之间的“肛交”行为容易使被动方直肠黏膜破损，从而提高了感染机率。

Butler 认为，文化体制惯于把异性恋取向定义为“正常”；在这一思维下，同性恋群体成为“他者”，其性取向被定义为病态和偏差。<sup>[9]</sup>早期媒体报道涉及的艾滋病形象始终是有害的同性恋行为，媒体鼓励大家把艾滋病看成是应该疏远的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功利主义的判断标准在生活世界里发挥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异性恋者居绝对多数的社会中，一切的价值

判断标准都是按照异性恋的逻辑和利益建构起来的,同性恋很自然地就被主流话语当作“异类”、“变态”、“心理扭曲”。在“知艾家园”中,同为感染者,同性恋者仍不免对同性恋感染者颇有微词,心怀歧视,甚至不惜用狠毒的语言予以攻击。

看你长那样子就知道你是同了,父母给了你一副男儿身,何必呢?(T\* \* p)

国家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给这些死基佬吃药。(r\* \* l)

同性恋行为可以说是兽行,国家应该立法打击这些人群。(5\* \* 7)

不难看出,在这些同性恋者的话语建构下,同性恋是一种有违伦常(“父母给了你一副男儿身”)、有违道义(“用纳税人的钱给这些死基佬吃药”)、甚至违法度(“国家应该立法打击这些人群”)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同样为性传播渠道的感染,同性恋性交传播要比性乱和嫖娼更为人不耻。

如果是找小姐感染的,那么说你是个纯爷们,要是搞男男肛交感染的,真恶心。(7\* \* 0)

妻子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孩子,但是隐瞒了我同志身份,只告诉孩子我是在外找了小姐传染了病。(半\* \* 世)

不管是态度的表述还是生活实践中,都可看出部分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群体的蔑视。即使到万不得已需要向特定对象公开自己的感染事实时,人们也普遍更能接受嫖娼的传播途径,而将同性恋的身份讳莫如深。他们甚至认为“找小姐”是“纯爷们”的表现,“肛交”则“令人恶心”,借对嫖娼的美化来进一步与同性恋群体之间划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限。

但是同时,艾滋病话语并非总是压迫性的,男同性恋者也在利用艾滋病话语运作自己的权力,福柯称之为“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sup>[10]</sup>男同性恋也利用艾滋病话语来为自己获取资源,凝聚更多的男同性恋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争取正当的权利,建构男同性恋的共同体。

网络作为一种交流平台对同性恋者的自我赋权和话语表述非常有益。“知艾家园”中的同性恋感染者努力建构符合同性恋群体利益的感染叙事。一方面,他们常常把“爱”作为身份叙述的主旨,强调性关系之外的真挚情感,与异性恋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差别。

大学毕业后,去了境外继续读书。在回来之前认识了我的他。从我们最初认识的时候,打算在一起的时候,恋爱到最火热的时候,和男生女生的爱情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爱。他对我很好,也很爱我,和我一起计划未来,以后要如何过一辈子,如果告诉家里,应该怎么面对,所有的所有,我们都考虑过,这不是热恋的头脑冲动呵。

在我所知道的GAY里,很多人的爱情,也只是简单地在一起,吃吃喝喝爱爱,在一起几个月就分开,或者有的吵一架就分开。很多时候,没有婚姻的承诺,没有社会的认可,感情变得很脆弱。(n\* \* n)

男同性恋者普遍不止有一个性伙伴。这条帖子没有回避这个事实,但却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缺乏“婚姻的承诺”和“社会的认可”,而非同性恋者感情生活的混乱不洁。在这名成员的叙述下,他们的爱情与“男生女生的爱情没什么两样”,他们有爱、有对未来的憧憬,这分明是一种浪漫的、值得歌颂的情感,怎么会是龌龊的、变态的性关系呢?同性恋者没有否认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但始终强调的是只要有宽容的社会环境,爱与忠诚就能够战胜病毒。

性取向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似乎一直难有定论。但无论如何,绝大多数人现在都接受了一个事实:性取向是受到诸多生物因素和社会习俗的双重影响,同性恋是很难随个人意愿而“纠正”的。银银河认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sup>[11]</sup>

作为一个gay,并非我愿,但既然走上了,我也无法改变什么。有时我会思考,很多人生本能的事物,无论作为一个族群,还是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所能改变的又有多少?这就像去告诉一个黑人,你们这样的肤色是反人类的,你们得改。但他们又能改些什么呢?这既不是他们

选择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w \* \* y)

这条帖子表述了两层含义：首先，成为同性恋是个人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事实，正如肤色一般；其次，仅仅因为差异的存在而歧视个体和族群是荒谬的。既然如此，就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文化取向，包括性取向。差别不应该是排斥的理由，生而如此更应该得到关爱而非蔑视。

其他一些论坛成员描述了一个有修养、道德高尚的群体，借群体素质来增加族群所能获得的社会认同。

我认识的一些同志，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有正当的工作，他们对感情专一、并不性乱，内心单纯、善良、乐观。只是因为世俗的偏见而锦衣夜行。如果说道德，他们并不差。(m \* \* 2)

除了在性取向上他们与我们不同之外，其余方面，包括对日常事务的判断，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并无特异。同性恋者中，出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和对人类文化事业建树卓著、热情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人士。(玻 \* \* 樽)

对同性恋者的品质彰显包括几个方面：一为对其判断与认知能力的认可；二为对其道德的赞美，包括感情专一、心性善良；三为对他们个人成就的肯定，他们“有正当的工作”，“出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只是“因为世俗的偏见”，大多数同性恋者“锦衣夜行”，难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支持和主体地位。不管是同性恋者的自我呼告，还是支持这一群体的异性恋者的“仗义执言”，这类话语都将同性恋从道德审判中解放出来，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的、合德的文化现象。

## 五、结 语

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艾滋病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侵入人体，造成对CD4细胞的侵蚀，进而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导致各种复合感染的一种综合征。然而在主流话语的建构下，艾滋病却附带了更多意味，关于其传染性，关于其与越轨有关的种种联想，关于其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污损。艾滋病人和感染者除了需要背负病毒带来的生理性困扰之外，还要承担污名、遭受排斥。

但是，话语实践既能产生“压制他者”的权力，也能为“他者”所用产生权力的抵制力量。在感染者得到说话赋权的网络空间里，战术上的话语抵制仍然没有磨灭，甚至无处不在；感染者利用艾滋病的“补偿”话语运作自己的权力，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艾滋病叙事，策略地利用“慢性病”“命运”“亚文化”等话语进行斗争，重塑艾滋病的话语边界。

### 参考文献：

- [1] 戈夫曼.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M]. 宋立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J]. 社会学研究，2009 (2)：181.
- [3]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125.
- [4] 德塞图. 日常生活实践 [M]. 方琳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7.
- [5] Norenzayan, A. & Lee, A. It Was Meant to Happen: Explaining Cultural Variations in Fate Attribu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8 (5), 702-720.
- [6] Zhang, J. W. & Ding, H. L. Constructing HIV/AIDS on the Internet: A Comparative Rhetorical Analysis of Online Narra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8 (8), 1415-1436.
- [7]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02.
- [8] Laumann, et 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9] 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 [10] 福柯. 性经验史 [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5.
- [11] 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 [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 Marginal Resistance under the New Media Discourse Empowerment

——Discourse Analysis of an AIDS Forum

Hu Yumeng

New media changed the picture of discourse control, and empowered marginal groups, enabling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n an AIDS online forum,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how individuals with the stigma of AIDS implement discourse resistan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marginal groups do not passively accept this stigma, but they also rarely clearly struggle for their rights. Instead they often try to dispel their stigma by using small, even poetic discourse. At least four strategies are used: to name AIDS as a “chronic disease” instead of “plague” or “infectious disease”, constructing a new AIDS knowledge system; to weave the sick into a logic of predestination, reduc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behavior; to emphasize the sub-culture feature of “promiscuity”, by expressing the view that sexual freedom is a form of natural human freedom; to rectify the concept of “homosexuality”, constructing an infection narrativ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gay community, with “love” as a clue and “tolerance” as a slogan.